

荆史钩沉

《明史》是如何评介张居正的?

□ 余大中

清代官方编纂的明朝正史《明史·列传卷一百零一(张居正传)》以近六千言的篇幅,为张居正这位明代中后期的改革巨擘立传,其评介既展现了史家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的笔法,又暗含着对改革者命运的深层思考。传记通过勾勒张居正从荆州少年到内閣首辅的人生轨迹,既肯定其“肩劳任怨,举废弛”的历史功绩,也揭露其“偏恣”“纳贿”的个人缺陷,最终在万历朝的政治清算与后世的平反中,完成对这位复杂历史人物的立体画像。

“国器”之誉与早慧锋芒是对才具的肯定

传记开篇即奠定张居正“颖敏绝伦”的基调。十五岁为诸生时,巡抚顾璘便断言其为“国器”,解扉带相赠时预言“君异日当腰玉,非不足覆子”。这一细节不仅凸显其少年才名,更暗示其日后肩负国家重任的命运。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后,张居正“日讲求国家典故”,徐阶等重臣“皆器重之”,展现出超越同辈的政治视野。

在权力更迭的漩涡中,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尤为突出。严嵩任首辅时,“善阶者皆避匿”,唯独张居正“自如”,既不依附权奸,又获严嵩“器之”;徐阶代嵩为首辅后,“倾心委居正”,临终遗诏亦引其共谋;高拱复起时,两人“益相密”,联手推动俺答封贡等边防大计。这些记载既展现其“沉深有城府”的性格特质,也印证其“勇敢任事,豪杰自许”的政治魄力。传记特别强调,张居正入閣最晚,却“独引相体,偃见九卿”,且“间出一语辄中肯”,令百官“严惮之,重于他相”,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其以才服众的首辅气象。

“尊主权、一号令”是对改革功绩的系统记录

《明史》浓墨重彩描绘张居正的改革举措,将其置于“万历中兴”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评价。传记明确指出,张居正为政以“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”为主,这十二字精准概括其改革的核心

逻辑。在具体施政中,考成法的推行让“一切不敢饰非,政体为肃”,解决了明朝中后期“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”的积弊;整顿漕运使“太仓粟充盈,可支十年”,改革马政令“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”,这些务实举措为明王朝注入了财政活力。

边防治理上,张居正的战略眼光尤为史家称道。他重用李成梁镇辽、戚继光镇蓟门,“成梁力战却敌,功多至封伯,而继光守备甚设”,两人“皆右之”,终成“边境晏然”的局面。传记特别提及“俺答款塞,久不为害”与“和市成”的成果,可见其对民族关系的积极影响。对于地方治理,张居正“核驿递,省冗官,清庠序”,虽因“持法严”招致怨言,却切实扭转了“承平久,群盗猖起”的乱象——“匪弗举者,虽循吏必黜;得盗即斩决”,终使“盗贼为衰止”。这些记载客观呈现了改革“利在社稷,怨在一时”的典型特征。

“夺情”风波与“偏恣”之失是对个人缺陷的直言不讳

《明史》并未因张居正的功绩而回避其性格与行为的争议。传记详细记载“夺情”事件的前因后果:李幼孜“倡夺情议”,张居正“感之”,冯保“固留”,最终导致吴中行、赵用贤等清流“皆坐廷杖,滴斥有差”。当时“彗星从东南方起,长亘天”,“人情汹汹,指目居正,至悬谤书通衢”,这些细节既反映士大夫对“忠孝”伦理的坚守,也暗示张居正晚年对权力的执念。传记直言其“自夺情后,益偏恣”,黜陟“多由爱憎”,左右“多通贿赂”,甚至“三子皆登上第”“苍头游七人赞为官”,这些记载虽未直接谴责,却通过事实呈现其“权势熏灼”下的失范。

对于张居正与冯保的勾结,传记亦不讳言。穆宗临终时,张居正“与保密处分后事,引保为内助”;冯保客徐爵“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”,甚至在张居正病重时“强居荐”自己的受业师潘晟。这些记载揭示了明代“内官-外臣”权力共生的畸形生态,也为后世万历清算埋下伏笔。史家的冷静笔触,让读者看到一个

既“慨然以天下为己任”,又深陷权力网络矛盾的形象。

从“文忠”到“剖棺戮死”是对历史功过的辩证反思

传记最深刻的部分,在于记录张居正死后的命运逆转。神宗初“为辍朝,谥祭九坛”,赠上柱国,谥文忠,礼遇堪比“国公兼师傅”;短短数年之间,却因张诚“密词”、李植弹劾,酿成“夺上柱国、太师,再夺谥”的惨剧,甚至“诏尽削居正官秩”,谓“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”。抄家时“饿死者十余辈”,长子敬修“不胜刑,自诬服”后“自缢死”,这些细节充满悲剧色彩,既是对万历帝“心抱其财”的无声批判,也暗合对改革者难善终的惋惜。值得注意的是,传记在文末引崇祯朝尚书李日宣的奏言“故辅居正,受遗辅政,事皇祖者十年,肩劳任怨,举废弛,弱成万历初年之治”,并记载熹宗、崇祯两朝对张居正的平反——“复故官,予谥祭”“复二荫及诰命”。这种“盖棺而未定论”的叙述方式,打破了传统史传“论赞”的单一评价模式,让历史功过在时间流逝中自然显现。尤其对张居正之孙张同敞“衣冠冠就革,颜色不变”的殉国记载,与张居正的改革精神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,暗示“忠臣之后必继其志”的价值取向。

《明史》的评介,始终在“功”与“过”、“公”与“私”的张力中展开。它既承认张居正“中外久安,海内殷阜”的治绩,也不回避其“偏恣”“纳贿”的瑕疵;既记录士大夫对其“夺情”的抗议,也肯定其“不敢以天下自逸”的担当。这种复杂叙事恰恰揭示了改革者的永恒困境:要打破积弊,必用雷霆手段,而手段的激烈又难免招致非议;要凝聚权力,必与体制妥协,而妥协的代价又可能玷污初心。从顾璘“国器”之誉,到李日宣“功在社稷”之论,《明史》最终以时间为尺度,确认了张居正的历史地位。这种“日久论定”的评价方式,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理性精神,也为后世思考改革与人性、制度与权力的关系,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。

文化漫谈



不以票房论姜文

——从电影《你行!你上!》说起

□ 老鱼

姜文这次栽在票房上,一点不冤,也一点不意外。《你行!你上!》上映到今天,票房勉强突破8000万,连隔壁重映的《哈利·波特》都打不过。影院经理说观众不买账,影评人说姜文观众不买账,社交媒体则把他当成鬼畜素材。可要是十年前你告诉我姜文会扑街,我大概会回一句“你行你上”。如今他真的上了,摔得挺响,倒让我把这些年攒下的疑问一起翻了出来: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姜文,又该怎么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?

先说结论:姜文从来不是票房的奴隶,也不是艺术的义士。他的电影就像北京豆汁儿,爱喝的人一口成仙,不爱的人当场呕吐。

从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开始,姜文就把“气味”当叙事。马小军推开米兰家的那个长镜,阳光、尘土、汗味、铁锈味一起涌进来,故事还没发生,荷尔蒙先冲你一眼。等到了《鬼子来了》,他跟黑白片拍出油腻的内感,一刀下去,血浆像过年杀猪接的热猪血,咕嘟咕嘟冒泡。观众看得直咧嘴,却不得不承认:这痛感是真的。等到《让子弹飞》,他干脆把叙事拧成一根麻花,台词密得像机关枪,人物站着不动都能打出弹道。票房炸了,很多人说这是“商业妥协”,我倒觉得那是姜文第一次让全国电影观众陪他玩了一场大型RPG,只不过多数人只刷到了第一关。

可他也常失手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,他把叙事拆成拼图,观众刚想进门,他啪一声把门反锁,只留一条缝往里喷彩色烟雾。《一步之遥》更任性,开场二十分钟像歌剧又像春晚,观众在影院里集体做阅读理解,最后读懂的没几个。票房自然难看,但怪谁呢?怪姜文没把故事讲圆?还是怪我们习惯了被三幕式喂养?这里就牵出一个老问题:好电影的标准到底摆在谁手里?

票房不等于好。多少年后,人们谈起《阿凡达》只记得蓝皮肤和技术革命,故事早被特效蒸发;票房低也未必是珍珠蒙尘,《大话西游》当年亏得周星驰开记者会道歉,如今却被供奉在神坛。电影好像一条活鱼,刚离水时怎么看都新鲜,过两天就腥臭难当,再过两年又成了咸鱼传奇。时间才是最大的影评人,可惜它从不提前剧透。

姜文恰好在这条时间里反复横跳。他最大的优点是死性不改:永远用雄性荷尔蒙丈量世界,永远把政治当段子讲,永远让摄影机唱了二锅头。他的镜头运动带着酒劲,左摇右晃,却总能精准停在人物最狼狈或最嚣张的瞬间。《让子弹飞》里张麻子炸火车,镜头先给观众一记耳光,再回头补一句“别急,还有更响的”。这种嚣张的节拍感,华语电影独一份。

可这也是他的宿命。当荷尔蒙失去靶子,当段子不再锋利,剩下的就是尴尬。《你行!你上!》里,他拍郎朗父子,本意大概是想解剖中国式天才的悲剧——父亲用巴掌雕刻钢琴家,儿子用琴键反抗血缘。多好的题材,可他太爱父亲了,爱到舍不得让父亲出丑,于是暴力被浪漫化成“严师出高徒”,母亲的缺席成了默许的合理。观众当然不买账:我见过太多真实的耳光,凭什么要替你美化?更致命的是,姜文这次没把节奏踩准。144分钟的电影,前100分钟都在展示郎朗如何拿第一,加长版版新联播,观众早把同情心耗光。等到真正的冲突要来了,影院灯亮了。

于是有人嘲笑:姜文终于为自恋付出代价。我却觉得恰恰相反——他栽就栽在不够自恋。以前他拍电影,哪怕全世界看不懂,也先让自己爽够;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那场婚礼戏,疯妈在屋顶上扔枕头,下面的人接不接得住,他不管,先扔了再说。这次他犹豫了,想兼顾观众,又想保留自己,结果像夹生饭,两头不靠。

说到底,评判姜文不能用票房尺子,也不能纯靠艺术滤镜。他的电影像一面哈哈镜,照出我们自己的偏见:有人看见天才,有人看见疯子;有人被荷尔蒙点燃,有人被爹味呛哭。好与坏,不过是镜子内外的人在互相打量。至于《你行!你上!》会不会在未来翻身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如果哪天深夜在电视上重看这部电影,听到郎朗任那句“弹不好就别吃饭”,也许还是会让你心头一紧——那一刻,电影好不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

姜文大概早就料到这结局。首映礼上有人问他票房怎么办,他咬着牙咧嘴一笑:“我拍电影,又不是拍票房。”说完转身走了,背影像张麻子,也像那个明知会输还要下注的赌徒。

翰墨荆楚



西线峡 (李小白)

改变楚国命运的十件大事(上)

□ 世标

从公元前1042年熊绎在丹阳受封子男之田,到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王翦攻破寿郢,楚亡,楚国存续八百余年,其兴衰轨迹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格局。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,十件大事如同十座界碑,标记着这个南方大国的命运转折,其波澜壮阔的历程,至今仍令人掩卷长思。

一、鬻熊附周:择木而栖的政治远见

当商纣肆虐,天下离心之际,楚人先祖鬻熊(公元前1106年——前1056年在位)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,毅然背弃风雨飘摇的殷商,率部归附崭露头角的周文王。凭借其巫师的身份,成为周文王的“火师”,率领部族在丹阳定居。这一抉择,不仅为部族赢得了喘息壮大的空间,更在周人即将建立的天下秩序中,为未来的楚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政治资本。

二、熊绎受封:筚路蓝缕的诸侯之名

周成王时期,鬻熊之曾孙熊绎(公元前1042年——前1006年在位)因先祖功绩及部落实力,正式获得周王室册封。他被封于“楚蛮”之地,爵位为最低的“子男”,赐姓“芈”,领地狭小(“子男之田”)。熊绎带领族人,以丹阳(今湖北南漳、保康一带)为中心,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(《左

传·宣公十二年》),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拓疆土。虽然位卑地僻,受中原诸侯轻视,但这一纸册封意义重大。

熊绎受封,标志着楚部族首次获得周王室承认的诸侯名分,获得了在荆山、雒水间合法生存与发展的法理基础,是楚国从部落走向邦国的正式起点。

三、熊渠伐郢:青铜时代的崛起密码

熊渠(公元前886年——前877年在位)是一位极具开拓精神的君主。他敏锐地认识到铜资源对于国家实力的决定性意义。当时位于今湖北鄂州一带的鄂国,控制着丰富的铜矿资源。熊渠果断发动“伐郢”之战,成功夺取了这片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。获得稳定铜源后,楚国得以大规模铸造精良的青铜兵器、礼器和农具,军事与经济实力迅猛提升。熊渠甚至借此威势,公然僭越称王,说“我蛮夷也,不与中国之号谥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,分封三子为王,展现了楚人突破周礼束缚的勇气。

四、创立县制:集权体制的先河之举

熊渠(公元前740年——前690年在位)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改革家。他灭掉权国(今湖北荆门一带)后,没有按照周代分封旧制将其封给贵族,而是直接将其设置为“权县”,派遣官员(县尹)进行管理,开创了历史上最早的县制。这一举措打破了贵族世袭领地的传统,加强了楚王对地方的控制力和资源动员能力。公元前704年,楚武王更是公然称王,挑战周天子权威。

楚武王创立县制,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。它标志着中央集权管理模式的萌芽,极大地强化了楚国的国家机器效能,为楚国持续扩张和争霸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,其影响深远,为后世郡县制奠定了基础。

五、迁都于郢:挺进江汉的战略中枢

楚文王熊赧(公元前689年——前677年在位)即位后,立即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决策:将都城从偏居荆山一隅的丹阳,迁至地处江汉平原腹地、交通便利、土地肥沃的郢(今湖北宜城南,后称“郢都”)。郢都地理位置优越,西控荆山,东临汉水,南接淮河,是北上中原、东进江淮、南下湘沅的枢纽。

迁都于此,使楚国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优越的经济基础。迁都于郢,是楚国战略重心从山区向平原、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标志性事件:它极大地优化了楚国的地缘政治格局,为楚国此后数百年的强盛提供了核心舞台,成为楚国争霸天下的强大心脏。

荆沙方言口语

- 23. 经扎
结实,耐用。有时也形容上了年纪的人健康状况不错。例如:您看起来还蛮经扎。
- 24. 先该
早就应该。口语。
- 25. 纠筋 纠经
口语,意思是十分顽强、固执己见,与人争辩,永不服输。例如,他这个人消缠得,太纠筋!有时形容吃的东西(肉食)没有弄烂,嚼起来费劲,说“好纠筋”。
- 26. 嘴劲客
能说会道,干实事不行的人。
- 27. 跳 发跳 跳跳神
跳,读音 tiao 第二声。抖动的意思。发跳,即发抖。例如:把他吓得跳跳神。
- 28. 扯跳子筋 扯跳子慌
扯和跳,都是抖动的意思。扯,多指两边扯动;跳,多指上下抖动。这里的意思是引申义:用来形容人的精神状态和性格。
- 29. 扯拉 扯巴子
网络上的荆沙方言口语,字讹、音讹很多,扯拉,多写作“策拉”。扯,读音 che 第二声。形容会来事,怪热情,精力旺盛,特别爱出风头、管闲事的女子。意思中性为多,稍含贬义。
- 30. 阿扯
这里的扯,同上。阿扯,常常指在讨论或辩论时,喜欢岔开话题,东扯葫芦西扯瓢,令讨论无法进行。逻辑上,表现为偷换和转换命题。